

文化中心與夜市經濟



善治若水 胡恩威

晚上看文藝演出前後可覓食：入場前先吃晚飯，也可以散場後吃宵夜。因此，香港文化中心是一個很適合推動夜市經濟的地方。

文化中心位於尖沙咀遊客旺區，附近有一個很大的露天廣場，連接天星碼頭和尖東海旁星光大道，交通四通八達。所以在文化中心廣場定期設立一些文創產品的夜市是可行的。而文化中心的大堂及周圍，例如香港藝術館和太空館，也可以定期舉辦一些不同類型的夜市、或者短期形式的特色咖啡館和小型餐飲車，吸引文藝愛好者流連。

文化中心佔地五點二公頃，以其面積與規模，足以形成一個有特色的文化夜市。既可集中售賣文創產品，在戶外空間也可定期舉辦一些音樂表演、街舞等活動，把文化中心一帶進一步活躍起來，並邀請參與文化中心演出的藝團，共同創造一個更大的夜市效應。要達到這種夜市效應，文化中心已經有硬件的支援，軟件就是如何有系統地吸

引遊客或市民到訪。用文化中心作為一個試點，好處之一是它毗鄰太空館、香港藝術館。這樣一個文化建築群既有美術館，也有表演場地，並結合科學趣味，相信可以產生很多協同效應。美術館應該延長其開放時間，而場外周邊設立配套夜市，如小型餐飲、小賣攤檔。政府也可以簽發臨時餐飲牌照以及酒牌，讓一些年輕人及小商戶去經營不同類型的生意模式。

整個項目的統籌可以由康文署及民間團體合作進行。若果要試行這個文化夜市，文化中心是有足夠的客觀條件，包括地理位置上、交通配套上、硬件設施上。而且夜市遠離民居，相信也不會對周圍的大型冷氣商場構成滋擾。因此，文化中心及其周邊是非常適合去推動一個集文藝表演、展覽、文創市集、餐飲服務於一體的綜合型夜市。這裏面既有戶內戶外空間，也有璀璨的維港夜景，將會形成別具吸引力的晚間旅遊熱點。

除了文化中心，沙田大會堂也是另一個適合搞夜市的地點。沙田大會堂有露天戶外地方，鄰近新城市廣場，交通方便。其實政府應該善用十八區不同的社區大會堂，在那裏開設文創類型的日和夜市，以增加客流，為市民和遊客創造不一樣的文藝經驗。



燈籠街掠影



市井萬象

中秋佳節將至，市民位於元朗大橋街市的「燈籠街」選購傳統燈籠，現場掛有近千個傳統手紮燈籠，吸引大人及兒童拍照留念。圖為有市民手持寵物刺蝟與金魚燈籠合影。

中新社

懸疑大師



英倫漫話 江恆

著名導演希區柯克有句名言，「生活除了呼吸，還有屏住呼吸」，可謂他懸疑電影作品的形象概括。早前文藝電影《我的名字是希區柯克》在英國公映，以希區柯克自我敘述的方式，讓觀眾走進這位懸疑大師的電影世界。

出生於英國的希區柯克作為電影史上的標誌性人物，想要講好自己的故事並不容易，該片另闢蹊徑，用演員扮演他本人並通過他之口進行自我剖析，同時利用大量電影剪輯和旁白，揭示他作品中的技巧和意義。用導演考辛斯的話說，演員的聲音和樣貌都模仿得維妙維肖，會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真是希區柯克獨自坐在愛德華七世時代的一間黑暗客廳裏，拿着他的磁帶來製作這個劇本的。

導演考辛斯將電影分解為六個主題：逃避、慾望、孤獨、時間、高度和實現，涵蓋了希區柯克長達六十年的藝術生涯中，總共拍攝的五十多部電影。觀眾從中會看到人物逃離危險或不幸，其作為懸疑片的核心元素，在希區柯克電影中屢見不鮮。慾望則是渴望快樂或性衝動，在希區柯克特寫鏡頭下，人物時常欣喜若狂地大聲疾呼。此外還會看到孤獨，儘管有時摻雜了與世隔絕，但這種孤獨感似乎更多來自於希區柯克自己。

英國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在《希區柯克傳》一書中，引述希區柯克的老同事休姆·克羅寧回憶稱，在希區柯克最後這幾年的時光中，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悲傷又相當孤僻的人，我經常去看他，發現他在一個人偷偷哭。他說不僅是因為工作不順利，還因為他已經不出門了。他看不到什麼人，也沒人邀請他去哪裏。」其實這不正是他想要的嗎？他從來不愛交際，除了和妻子阿爾瑪之外，他從來沒有和誰建立起長久的友誼。但因為他背叛了婚姻，阿爾瑪現在只是他生活中一個悲傷的存在，所以他基本上是孤身一人了。

然後就是時間，尤其是時間的流逝和與時間的賽跑，比如《驚魂記》中的珍妮特，利向推銷員施壓，要求其在汽車被識別之前將其部分交換；《電話謀殺案》中的雷·米蘭德意識到他的手錶已經停了，並拚命尋找一

個空電話亭來撥打他致命的電話等。不得不說，類似的符號性隱喻，在希區柯克電影中被大量運用，最著名的就是鳥，他將鳥的嘶鳴和暴力死亡畫上了等號。像是《謀殺》裏的兇手在馬戲團表演中穿着一身鳥的戲裝；諾曼·貝茨辦公室裏的鳥類標本暗示了《驚魂記》中的死亡和腐壞；《訛詐》裏，艾麗絲·懷特從兇殺案現場回來後，籠子裏一隻唧唧喳喳的鳥兒向她打招呼；《陰謀破壞》裏的致命炸彈藏在裝金絲雀的籠子裏；《年輕姑娘》裏一群水鴨尖叫着飛過屍體，等等。

至於高度，是希區柯克對特殊鏡頭運用的熱愛，例如《迷魂記》中令人眼花繚亂的畫面。當然也包括他對色彩的痴迷，如同《希區柯克傳》中所言，他不僅精心設計街道上汽車和看板的顏色，還安排好房間裏燈罩和鮮花的配色，比如，淡藍色和檸檬綠等冷色被用來傳達理性和客觀；黃色和紅色這樣的暖色則被用來暗示情緒波動和危險的來臨。在《電話謀殺案》中，演員格蕾絲·凱利的衣服從紅色變為橘色，最終又從灰色變為黑色，她的每一段情緒的波動都用顏色戲劇化地表現了一番。對於《西北偏北》的女主角，他想像了一件厚重的黑色絲綢雞尾酒會禮裙，上面印着一朵朵酒紅色的花朵，這出現在她欺騙加里·格蘭特的場景中。

在實現部分，觀眾會看到希區柯克表面上平靜的家庭生活，實際上他卻因非禮《艷賊》的女明星蒂比·海德莉而幾乎毀掉聲譽。最為人知的就是他扮演了一個靚靚女性並且進行肆

無忌憚的性騷擾角色，直到他去世若干年後，海德莉在她出版的《蒂比回憶錄》中，仍指控他當年如何行為不端，這也成為他抹不去的人生污點。

除了考辛斯的這部文藝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代表人物特呂弗對希區柯克的採訪，亦為觀眾提供了另一個視角，這一場著名的對話持續了數天時間，甚至被視為希區柯克的「遺囑」。在對話中，希區柯克稱不想太深入地探討他拍某部電影、某個特定主題的動機或原因，他只對故事或情節感興趣，正是這些激發了他的視覺想像力。按他的話說，一個擅長摹寫靜物的畫家，不在乎筆下的蘋果到底是酸的還是甜的，他全神貫注於秩序、圖案和對稱，他電影裏那些螺旋圖案、階梯、豎直的欄杆和百葉窗都證明了這一點。

而希區柯克所做的這些努力，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取悅觀眾，就像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採訪中所說，「若要娛樂大眾，開場便要抓住他們的興趣」，可是「如何把膠水塗在觀眾的座位上」？膠水來自害怕、焦慮、恐懼、懸疑或好奇。為此，他在電影中設法把觀眾逼到一種無法忍受的緊張狀態，某種程度上甚至達到了極致。

正如美國學者托馬斯·利奇所說，僅有故事是不夠的，一部成功的希區柯克電影更像是一場遊戲，而非一個故事。他通過他的客串，擬人化的鏡頭移動，顯著的剪輯，好玩的障眼法，和聰明的開場場景，激活了這個遊戲。



▲《電話謀殺案》是希區柯克經典作品之一。

劇照

當快遞員開始寫作



黛西札記 李夢

近來通勤路上，常翻看的一本書，是《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胡安焉曾在多間快遞公司擔任派送員，辭職後，喜愛寫作的他，在編輯朋友的鼓勵下，執筆將自己多年工作的苦樂經歷寫成文章，起初在文學類網站發表，後來成書，獲眾多豆瓣網友關注，評分亦常年維持在八分之上。

看胡安焉的文章，每每讓我想起Maud Lewis等素人畫家作品，都是真誠、直白，對於所見與所想絲毫沒有遮掩或矯飾，完全地盡抒心意。大學畢業、初入社會的胡安焉，曾經在動漫雜誌做過一段時間的編輯，因無法忍受編輯部過於商業化的運作模式，辭職後與友人合夥經營女裝生意。競爭激烈、充滿壓抑與壓力的女裝批發市場，讓胡安焉難以適應，索性再次離開，輾轉多地，後來去到廣東一間物流公司擔任夜間理貨員。

十個多月的理貨員工作，讓他疲憊不堪，卻也激發了他的寫作靈感。《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成為他的初露鋒芒之作，在其中，他務實、坦誠的寫作風格正在養成。文筆細膩、觀察敏銳，將社會底層打工人的生存現狀、焦慮與夢想，不緊不慢地講述出來，沒有過度的悲喜憂樂，反而讓讀者心有戚戚。胡安焉書中人物，常常讓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他們曾出現在何偉的《江城》和《尋路中國》中，也曾



▲《我在北京送快遞》今年三月出版。

經出現在賈樟柯當年的電影裏。此前，創作者更多的是旁觀的、局外人的姿態，而在《我在北京送快遞》中，局內人既是書中主角，也是敘述的主體。書中的「我」是一名快遞派送員，穿行在繁華城市的大街小巷間，是主角，也是牽引，將不同背景、性格和命運的城市男女的故事串聯起來。由此來看，這本書既是快遞員自己的故事，又何嘗不是道出了鮮活熱辣的人間百態？

閱讀此書的經歷，或許可以與觀看日劇《深夜食堂》的經歷對照來看。同樣的城市繁華，同樣的平凡男女一日三餐，同樣隱藏在看似平靜的敘述背後的寂寞和難以言說的憂傷。城市化的當下，眾人群聚，一方面享受高效便捷的服務，而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日益疏遠，人情日益隔膜。書中儘管不少不如意事，但作者收筆時仍溫暖且樂觀：與其沉溺在抱怨與焦慮中，倒不如，果敢走出去，直面生活的苦辣，以及每一個平凡卻意味深長的瞬間。

記上海淘外文舊書



如是我見 海龍

我曾寫過紐約舊書肆今昔和淘書撿漏的文章，最近又時常回憶起在上海舊書店的淘書歲月。其中許多細節難忘，值得一記。

當年上海遠無今日繁華絢麗。那時一切都還是樸素模樣。上海直到一九九三年始有地鐵，此前城市交通全賴巴士。巴士擁擠態今人不堪想像，好在那年頭不時興旅遊，大家無事不出行。所以到上海福州路舊書街淘書雖為畏途但每去總有收穫。

那時尚無上海書城這類高樓大廈，福州路一帶商業街還保留舊上海模樣，多為幾層小樓，書店跟文物商店、古玩、食肆和百貨公司擠在一起一點都不違和，充滿市井煙火氣。當年古籍線裝書、現代文學版本書以及舊雜誌、字畫類淘寶已經有不少人寫文回憶。我想寫一下較少被言及的門類即古舊外文書淘書。

記得當年書城一帶專賣古舊外文書的店家不多，多為兼營外文書，一般在古舊書店

裏另設個門面。根據淘書印象，那時所售外文書都比較舊，多是上世紀前的書，較少見到一九六〇年後的出版物。

去的次數多了，對這些書來源和分類有了個粗粗的印象，它們大致上可以被分為兩種類型。其中一類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四九前後幾十年洋人離滬時的甩賣物。昔日上海是個冒險家樂園和世界大舞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魚龍混雜有各類外國人混跡於斯。從晚清傳教士、商人、外交官到學者教師甚至外國駐軍，這裏曾經有大量白俄、各國租界和日本人常駐，他們離開時或賣或扔了不少書，其中有不少劫餘到了舊書店。這些書因為來源蕪雜，泥沙和明珠俱備；有趣的是外文書不像中國典籍比較容易識別和估價，所以它們往往會被混亂置放或根據書籍裝幀索價。其實裝幀一般的書裏面往往有奇貨或好的珍本。但是買外文書需要外語和文化修養及相應的慧眼和專業知識，所以這裏門庭冷落，而且購書者往往非常耗時篩選

——但這些條件也提高了淘書的奇遇和撿漏的可能，所以淘外文舊書的樂趣無窮。

當年在上海讀研時發現不少外文舊書上有名人簽名鐫章和旁註。同學輩有人買到邵洵美購藏的瓦爾德舊書，也有人買到復旦教授楊雲深簽名書，據說也有買到施蛰存等現代作家藏書的。那時買外文舊書遇到這類「撿漏」機率不算離奇。舊時讀外文書人家很少，而外文書多精裝，這些美輪美奐的書都有可能是出自名家豪門。當年一般百姓不讀外文書，而且那時市民工資低，月薪大約人民幣五十元，一本索價三至五元的精裝外文舊書或可以是大學生一星期的飯錢。

當時有些外文書店購書要介紹信。但我已在高校任教讀研研究生有教師紅校徽，一般也被開方便之門可以選購各類參考書。記得我們翻譯課教材就是教授淘到英國作家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拆開複印作授課講義。

我那時熱衷西方人類學，可惜這類書很

少。印象較深淘到的有研究比較文明的一本書。除了書脊，其他書頁邊緣三面都刷了金，閃閃發光。當年內地出版書用紙比較糙黃，這書全道林紙精印而且插圖皆為銅版畫，是我當年見到最豪華的書。買下細讀之後發現它當屬於二三十年代海外留學生的舊物，有原主人的批註和閱讀心得；其中有一組古羅馬詩人卡圖魯斯詩歌內地尚未介紹過，我將其翻譯並配文發表於《名作欣賞》賺了一筆稿費後又買了一批外文書，它們曾經滋養過我，現在應該還躺在親友家書房的某個角落。

一九八〇年代隨着學界需要，外文新書漸被翻印，包括工具書和一些供專業人士和學界參考的外文新書。那時偶或全文翻印原版外文書而售價極廉，但這類書籍一般不對外公開，書封底上印有「內部發行」字樣。這樣的新書也在舊書店公開發行，雖然沒有版本價值，但對了解西方社科和文史哲學向有着不可替代的好處。